

非物质文化景观研究：载体、空间化与时空尺度

李仁杰^{1,2}, 傅学庆^{1,2}, 张军海^{1,2}

(1. 河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石家庄 050024; 2. 河北省环境演变与生态建设实验室, 石家庄 050024)

摘要：非物质文化地理学研究还未形成统一的思维体系,难以将地理信息科学的方法引入研究过程。提出了非物质文化景观载体思想,包括艺人、文化团体、作坊、作品、受众、店铺与市场等实载体和互联网等信息空间中的虚拟载体。通过载体空间化,将非物质文化景观研究融入传统文化地理研究框架中。将非物质文化景观研究的空间尺度划分为大、中、小和微观尺度,并对单文化、多文化和全文化载体景观的时间尺度界定进行详细剖析。在载体、空间化和时空尺度等基本问题解析的基础上,吸纳新文化地理学思想,建构了非物质文化景观研究的时空思维体系,并使研究视角趋向多元化。基于文化载体的时空思维体系是地理信息科学方法用于非物质文化地理研究的基础,对文化地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文化景观;载体;空间化;时空尺度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13)03-0049-07

0 引言

传统人文地理学的文化景观是人们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景象。文化景观与特定地理环境相适应而产生和发展,保存了大量物质形态化的历史景观和非物质形态化的传统习俗,共同形成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体系^[1]。人文地理学家采用简明、抽象的地图方式表现聚落形态、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样式等物质文化景观的特征、格局和演化,挖掘景观中的人地关系内涵等^[2-4]。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理信息系统(GIS)开始应用于聚落景观的数据管理与分析^[5-6]。非物质文化景观指不一定具有物质形态的人类创造物^[7],如语言(含文字)、艺术(含技艺)、宗教、情感、哲学、价值观和法律制度等。非物质文化景观如何抽象表达,给地理学者带来了第一个挑战。非物质文化虽然不一定具有物质形态,却可以直接或间接承载于各种文化载体,通过有形文化载体的空间属性,建构特定视角的文化景观,实现与传统文化景观整合,解决非物质文化景观表达的障碍。例如,借助文化艺人的籍贯、生活地域,或寺庙、教堂、作坊、店铺等文化场所的空间属性,表现艺术^[8-10]、宗教信仰^[11-14]、民俗^[15]、语言^[16]、地名^[17-18]等文化景观。

通过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空间载体,就可以利用 GIS

等新技术平台,进行文化信息管理与挖掘。文化景观表达一般是先确定空间单元,再将文化载体配置到该单元上,例如,将地方志中对民俗、宗教等文化现象的记录分为“有”和“无”,对应属性值“0”和“1”^[19]。这种方式虽然符合传统文化景观描述思维,但忽略了太多文化意义。新文化地理学强调审视文化的方式,景观因此也成为意识形态的表现^[20-21],这种景观思想颠覆了将景观作为客观实在和中立世界的传统观念^[22],地理信息技术能否表征文化景观的多种审视方式,挖掘多元化景观意义,成为地理学者面临的第二个挑战。目前还没有一种相对完整的思维体系用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信息管理,相关研究中也难以应用 GIS 开展文化信息挖掘。

本研究针对上述两个挑战,从文化载体、载体空间化和时空尺度等多层次视角,试图构建非物质文化景观研究的时空思维体系,使其能够借用 GIS 理论与方法,满足新文化地理研究转向的学术需求;也使文化地理学从过去对文化开展空间研究或(地理)空间分析(如划分文化区),转向对(地理)空间开展文化研究^[23];使其不仅能够表现传统文化地理视角,也能表征文化景观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

1 文化载体与空间化

无论是眼睛看到的景观、景象,还是大脑的意想景观,非物质文化景观建构必然要有文化载体。例如,基于教堂^[13]、教案^[24]、神庙^[12]等研究宗教与民间信仰文化景观,基于剧团、观众研究戏剧传播^[8],基于书法家研究书法文化景观^[10,25]等。非物质文化景观是多元文化载体的自然融合。载体具有时空属性,不同时空尺度下的载体可以从不同视角表征文化景观;从相同视角研究文化景观时,选择不同载体也需要确定适宜的时空尺度。因此,阐明文化载体的类型和内涵,解析文化载体时空

收稿日期: 2012-04-06; 修回日期: 2013-03-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971089); 河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学科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李仁杰(1975-),男,河北鹿泉市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空间信息表达与建模研究,(E-mail) lrjgis@163.com。
通讯作者: 张军海(1964-),男,河北邢台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地学信息图谱与可视化研究,(E-mail) zhangresc@163.com。

属性,进而实现载体多时空尺度表达,是认识非物 质文化景观的基础,是探索自然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下文化景观建构过程的关键。

1.1 载体类型

文化载体必须承载特定价值和情感内涵。非物质文化载体丰富多样,承载着文化记忆和技艺的艺人(传承人)是艺术类文化景观的核心载体。文化演化过程中留下的各种物质化遗存形态也可能成为文化载体。根

据载体对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传播、认知等是否有重要贡献,并按照其是否具有实体形态将文化载体划分为实载体和虚拟载体。“艺人(传承人)、文化团体、作坊(场所)、作品、受众、店铺与市场”6 种类型属于实载体。虚拟载体则是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虚拟信息空间的特殊载体。各类型载体的内涵解释和空间属性如表 1 所示。

表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载体类型与空间属性
Tab.1 The types and spatial attributes for landscape carriers of intangible culture

文化载体	载体文化解释	空间属性
实载体	艺人(传承人)	籍贯、出生地、生长地、居住地、艺术创作地、艺术传播地等
	作坊(场所)	座落位置
	作品(产品)	诞生地、收藏地、展示地等
	文化团体	文化团体的座落地、表演活动空间等
	文化受众	各类文化受众的居住地、工作地
	店铺与市场	店铺、农村集市位置;店铺和集市销售区
虚拟载体	互联网载体	载体的社会影响地域;网络店铺所在区域、销售区域
	其他虚拟载体	载体的社会影响地域

虚拟载体也有多种类型。互联网中的虚拟载体包括文化部门官方网站、文化主题网站、文化主题电子社区、电子商务网站中的电子商铺,以及艺人博客等。不同类型的虚拟载体建构了非物质文化的虚拟空间。例如,政府部门建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http://www.chinaich.com.cn>)”、剪纸艺术专题网站“中国剪纸艺术网(<http://www.paper-cut.com.cn>)”、淘宝网中销售非物质文化商品的店铺、民间剪纸艺术家在新浪微博开通的剪纸主题微博等。

非物质文化景观建构于文化载体之上。文化传承景观主要通过艺人(传承人)、作品等载体表现;文化传播景观则依托于作坊、店铺与市场、文化受众等载体;文化认知景观载体主要是文化受众。同一文化载体并非仅适合表达一种景观视角,有时会对两种甚至多种景观建构具有贡献。虚拟载体(尤其是互联网空间)已经逐渐成为重要的文化景观建构元素,对非物质文化传承、传播和社会认知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是当代非物质文化演变的重要作用力。因此,虚拟载体表征的文化空间也逐渐进入文化景观研究视角。

1.2 载体空间化

载体空间化是根据各类文化载体的空间属性,将景观元素定位于地理空间,进而能够通过多时空尺度描述非物质文化景观。借助不同载体的空间化,从不同视角审视非物质文化景观,把握各类意识形态中的文化景观特征,挖掘景观背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意义。同一载

体往往具有多种空间属性。例如,艺人载体可以从籍贯、出生地、生长地、居住工作地、艺术创作地、艺术传播地等多种空间属性进行空间化。艺人籍贯、出生地和生长地更多表现地方文化对艺人的熏陶与培养过程;而艺人居住工作地相对于籍贯、出生和生长地的变化,更多反映艺人对文化发展、传播的作用,以及文化演进的驱动力。

载体空间化为非物质文化景观研究提供了多元化思维空间和空间思维模式。姚华松等将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空间分为 5 种类型,包括区位的空间、构建的空间、实体活动空间、社会空间和感知空间^[26]。非物质文化载体空间化结果即表现为不同视角下的文化景观,可以涵盖上述空间类型。例如,艺人和文化受众两种载体表现的文化景观,表征了文化核心区域和传承空间,是根据人的文化属性而“构建的空间”。店铺与市场载体则可以表征文化商业转向,属于“区位空间”。代表性艺人(传承人)在艺术创作、传播过程中的行为空间属于“实体活动空间”。被授予各类称号的传承人与普通艺人形成了具有明显社会特征差异的两种“社会空间”。文化受众居住地构建的文化景观表征公众对文化的“感知空间”。多种类型空间之间相互交织、隔离或渗透。例如,文化受众的感知空间,可以折射出消费群体的阶层,反映不同的社会空间;地方居民日常生活主要消费普通艺人作品,形成民俗社会空间;权贵、精英社会阶层收藏著名艺人作品,形成高雅奢侈社会空间。总

之,多类型空间的有机体才是文化景观解读的完整结果。

许多传统文化景观的地理学描述体现出文化载体空间化的思想。例如,“蔚县剪纸”一词内涵了剪纸民俗文化的核心区域(文化区),是综合艺人和地方居民两种载体的描述方式,艺人体现了艺术传承空间,而地方居民体现了艺术的受众空间。但普通语言描述的文化景观缺少统一表达规则,难以借力 GIS 的计算方法与模型实现空间信息挖掘。只有建立规范的载体空间化表达体系,才能用空间数据库模式管理文化信息,实现可视化表达,并通过自由组合观察视角,挖掘景观的空间意义,实现空间的文化研究。

2 景观表达的空间尺度

已有非物质文化的地理研究中,描述文化景观的载体比较单一。单一载体研究往往选择单一空间尺度,或仅在单一空间尺度下利用多时间尺度表达文化演变。单一空间尺度将研究视角限制在传统区域学派理解的物质实体空间,或空间分析学派理解的几何关系空间。但新文化地理学更倾向于将空间关系看成是社会关系,关注空间如何作为文本意义系统、象征系统、所指系统来表达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以及民族主义和国家关系^[27]。因此,新文化地理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景观研究中载体多元化成为重要特征,景观的实质是各文化载体空间化的综合表征。空间尺度的实质是文化载体的空间尺度,文化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表现不同^[23],不同载体空间化与抽象表达必须考虑适宜的空间尺度,减少尺度推断错误^[28]。

2.1 大尺度景观

大空间尺度非物质文化景观通过多种载体,以及载体的多种空间属性表征,主要表达文化的宏观区域格局,从多元化视角整合解读文化景观。大空间尺度可以从一个国家或自然社会区域单元扩展至洲际(或其他文化与政治区)甚至全球等。例如,非物质文化产品的店铺与市场等,可以反映文化商业转向中形成的大尺度区位格局;代表性艺人(或传承人)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普通艺人,其艺术创作和传播的行为空间域往往比较广阔,可以涉及国家的许多区域,甚至扩展到世界各地;非物质文化产品中的精品文化受众一般会扩展到地方之外的大范围区域,受众群体类型也丰富多样,因此,精品文化受众群体形成了一个多元表征符号,由这一群体的居住地构建的大尺度景观展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感知空间。

多载体综合表达的大尺度景观,可以描述文化传播与扩散、文化认知和文化融合等。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流派的实质是由著名艺人和文化受众等载体综合表征的社会认知空间。著名艺人载体对于流派的社会认知和影响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外

界文化受众群体;地方文化受众则是文化成为一种民俗活动的推动者。多种载体组合建构了文化景观流派的地方性(区域性),并能够清晰反映不同文化的地域分异格局与地域耦合,如中国剪纸和木板年画艺术各自形成了南北两大流派,两种文化的南北区域流派有很高重合度,如南方流派在江苏、广东,北方流派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区域重合。

2.2 中尺度景观

中尺度文化景观中的载体单元边界会更清晰,文化地方性开始凸显。许多非物质文化都贴上了地方标签,例如,中国木版年画中的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以及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河北武强年画等。上述各地木板年画以地方受众为主体文化消费群体,长期以来不断吸纳地方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内涵,凝练出各木板年画的地方特点,并形成了社会公众认知的区域文化流派。

中尺度适宜展示文化景观格局中的文化层级,也能表征文化流派间的艺术渊源、文化竞争与文化融合。中尺度景观可以从3个层次表现区域流派语义:一是大文化流派下的二级区域文化流派景观,如河北蔚县、丰宁、三河、磁县等剪纸流派的核心文化区;二是相同文化二级区域流派之间的社会和空间关系,如北方剪纸流派中由于空间邻近性和交通便利性等原因,山西广灵剪纸与河北蔚县剪纸流派具有较长的历史文化渊源,并有文化相互融合现象;三是不同文化区域流派间的社会与空间关系,如河北蔚县剪纸吸收了天津杨柳青年画和武强年画的艺术内涵,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

2.3 小尺度景观

在小尺度景观中,文化解读视角将趋于丰富和多元化,并能够实现与大中空间尺度的衔接对话,因此,小尺度成为文化转向的关键尺度。该尺度下的载体空间位置更具体精准,可以反映某文化流派景观的内部区域分异;文化核心的形成过程开始显现,文化与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逐渐清晰。文化的商业转向等特殊景观视角可以在小尺度下通过作坊、店铺、市场的区位空间进行表征;区位等级体系产生的时空过程则折射出文化商业转向中隐喻的文化权利争夺。

以河北蔚县剪纸为例,按照艺人籍贯地进行载体空间化,建构蔚县剪纸文化景观。剪纸文化在蔚县区域内广泛分布,无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无论是城镇还是偏僻乡村均有艺人分布;壶流河畔孕育的农业文化聚落区域同时也是剪纸文化景观的主体区域,体现出剪纸作为日常生活元素的大众艺术内涵;以县城为中心的区域,艺人分布密度明显增大,形成蔚县剪纸景观的核心区,蔚县剪纸文化名片的南张庄正是位于这一区域。蔚县剪纸一直以来还是艺人谋生的重要形式,艺人分布表现出对经济中心和市场的强依附性,例如,主体景观区正是县域经济商贸的核心区,紧邻县城的南张庄更是将县城

作为文化经济的核心依托地域。

2.4 微观尺度景观

微观尺度下的文化景观表征视角从文化外围扩展到文化内部,使研究者有机会关注福柯强调的“空间、权力和文化的关系问题”^[29]。任何空间都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因此,空间能够强化文化;而权力则是透过强势文化群体的空间垄断以及将其他弱势群体排斥到其他空间而表现出来的^[30]。店铺和市场的区位等级在小尺度景观下已经明显,而微观尺度分析更可以阐明其演化背后的权利争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社会的认可往往源于出类拔萃的代表性艺人,在文化仅作为一种地方风俗的阶段,代表性艺人与普通艺人一样,仅仅是风俗的建构者。但随着文化扩散,当文化产品走向文化区之外并成为经济价值更高的商品时,商人和部分代表性艺人对文化权利的争夺就开始显现。大的文化产品加工厂的规模化经营更迫使普通艺人抛弃家庭手工作坊而为大工厂生产订单。

2.5 动态尺度:跳跃、转化与组合

文化景观研究的空间尺度是动态的,它随着景观审视视角和文化演变的空间性而不断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社会认知域在文化演变的初始阶段可能涉及很小地域,地方性很强,受外界干扰也很小,因此,利用小尺度即可准确把握景观内涵;随着文化扩散和演变,文化区和社会认知域不断扩大,文化与外界的交互性增强,涉及地域范围扩大,中尺度可能成为文化景观研究的较好尺度;而随着核心文化受众的继续扩大,文化社会认知地域也继续扩散,大尺度会成为文化景观研究的新视角。景观空间尺度具有跳跃性,尺度动态转换的本质是视角的变化与跳跃,必要时还需多尺度的组合,以实现文化景观的多元解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重点保护的今天,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开始成为地方宠儿。代表性艺人的活动空间从地方核心文化区内迅速迁移并聚集到临近的地方政治、文化与商业中心(县城、城市),并向全国其他区域扩展,有的还走出国门进行艺术传播。艺术活动空间格局的演化不仅能够反映艺术本身的社会影响域变化,更是公众对艺术认知时空变化的反映。要全面解读政策影响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必须实现多空间尺度间的跳跃^[31]、转换和组合,在多时空尺度下通过多文化载体折射出不同的文化景观内涵。

3 景观表达的时间尺度

多种时间尺度的划分能够弱化或突出文化景观的某种社会意义。如较长尺度能够表征文化的生命周期,但可能会弱化商业转型期的权利争夺。相同文化的不同载体时间属性也不完全一样,文化发展初期可能没有作坊,当文化成为居民的生活方式时,代表规模化生产空间的作坊也就诞生了;当代互联网空间中的虚拟文化

载体更是仅有 20 年的发展历程。因此,景观表达的时间尺度需要考虑载体的时间属性。

3.1 时间尺度划分

时间尺度划分以文化景观研究视角为依据,既要考虑景观过程经历的平均时间,也要结合载体的时间属性,更要适宜在该视角下开展工作。文化演变周期的研究多需要较长时间尺度的划分;而对文化过程中的特定历史阶段研究,时间尺度划分就要考虑该阶段长短,属于中时间尺度划分;针对文化过程中的特定断面研究的时间尺度可能会非常短,属于文化过程的小时间尺度研究。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变周期不同,不同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特征,所以时间尺度划分既有基本准则,也有很大不确定性。确定适宜时间尺度,并根据文化过程进行动态调整,是进行文化景观过程研究的基础和关键。

基于时间尺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研究中,较多描述文化景观的生命周期过程(起源、发展、繁盛、稳定、衰落或再发展等),载体一般选择文化艺人(传承人)。文化生命周期的时间尺度划分间隔往往接近文化传承的代际间隔。但如果考虑文化演变过程中的文化风格、传承模式、商业转向等更为细致的历史阶段变化,则需要根据相应载体时间属性进行尺度扩大或缩小。例如,中国剪纸艺术从家庭作坊(1950 年以前)、家族工厂(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社会工厂(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生产模式演变,不仅是整体文化景观生命周期演变的一部分,更内含了剪纸文化商业转向的强度和规模。时间尺度不是等间隔的,也不是程式化的,而是动态的、专题化的,是融入了文化观察视角的划分模式。

3.2 载体选择引起的的时间尺度变化

选择不同载体进行文化景观研究时,时间尺度划分会随载体时间属性发生变化。同一文化的不同载体具有不同时间尺度,这就提供了从多元视角观察和分析景观过程的思维模式,为景观过程的影响因子和驱动机制分析奠定基础。对单文化载体来说时间尺度划分相对简单;而对多文化载体共同表征的景观过程,则需要综合考虑相互交融的载体时间属性。由于各载体时间属性差异明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的时间尺度划分比较困难。下面从单文化、多文化和全部载体 3 种表征方式,说明时间尺度划分的方式和意义。

3.2.1 单文化载体时间尺度。单文化载体随时间演变的景观过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观察视角,也是社会文化学者描述文化的常用视角,能够深入剖析文化内涵。单文化载体虽不能独立建构文化景观,但却是构成景观的直接单元或元素,对景观过程的整体解读具有基础意义。时间尺度划分要根据载体发展特点和具体过程进行划分,既可以关注个人艺术的整体成长阶段,也可以关注作品内容和数量的时间变化,还可以关注授艺与交流的时间特征。不同划分方式带来不同的文化景观解读意义。例如,将代表性艺人的艺术成长阶段分别

与其居住、学艺、授艺等地点进行时空整合,就可以成为该文化地域流派(或地方性)演化的核心表征符号。以蔚县剪纸为例,将该地方流派的关键人物王老赏的学艺、居住、授艺和艺术交流等地点进行时空表达,不仅表征了蔚县剪纸的内部扩展、外部扩散与文化融合,同时,也建构了蔚县剪纸的代表性历史阶段。

3.2.2 多文化载体时间尺度。多文化载体既可以指代多个同类文化载体(例如艺人),也可指代不同类文化载体(如艺人、作坊、作品等)。多文化载体研究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景观主题,如文化商业转型景观、文化传承景观、文化认知景观等。因此,多文化载体时间尺度划分主要考虑景观主题,根据主题形成的时间跨度和景观变化频度进行合理划分。例如,文化传承景观可以由多个不同时代的传承艺人建构。蔚县剪纸以家族代际传承为主,也伴有少数跨家族、跨聚落的技艺传承,保持了文化的地方性特征;不同代际剪纸艺人通过相互间的师徒关系,展现了蔚县剪纸的文化传承景观,同时也建构了蔚县剪纸长期以区域内部为主的文化时空扩散过程。文化商业转型景观可以由艺人、作坊、作品、店铺、文化受众甚至网络等多载体建构而成,其时间尺度划分要考虑多个载体的时间属性。以产品加工、销售量测算的年内周期性变化可以折射文化景观民俗内涵;围绕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主题进行的生产和销售则是非周期性的随机变化,但这类时间属性中隐含的发生频率可以反映

商业转型的速度和文化演变强度。

3.2.3 全载体文化景观时间尺度。以往文化地理研究多以单文化载体或同类型多文化载体为基础,开展不同时间尺度的文化景观演化研究;载体选择多是艺人或作坊、店铺等。这种解读方式的好处是文献中载体的时间属性明确且容易获取;而且由于研究主题单一,使时间尺度的界定也比较简单。但文化景观是各种文化载体综合表征的结果,不同文化载体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机制是全面认识文化景观特征的主要途径。因此,必须考虑整体文化景观的建构,并寻找整体文化景观研究的时间尺度划分依据。时间尺度划分既要保持相对统一,方便研究中的时序对比,也要考虑不同载体的属性差异,实行必要的尺度调整,甚至可以采用动态时间尺度。

4 文化景观的时空思维体系

借助多种文化载体,使非物质文化景观研究不仅可以引入物质文化地理研究的方法和理念,也能够通过载体透视景观背后的内涵和隐喻,让非物质和物质文化景观有了空间整合的基础。多时空尺度及时空尺度的动态性为非物质文化景观带来多元化解读视角,能较好地吸收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根据前面论述的基本问题,本研究设计了一个非物质文化景观研究的时空思维体系(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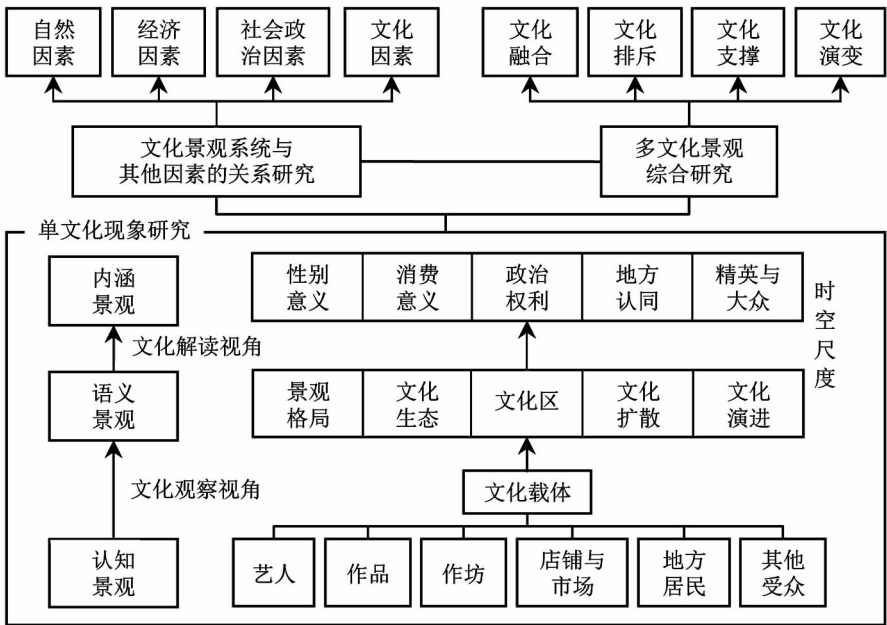


图1 非物质文化景观研究的时空思维体系

Fig.1 Temporal and spatial thingking system for researches on intangible culture

这一时空思维体系改变了传统文化地理研究的自上而下模式,采用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艺人、作品、作坊等多文化载体使非物质文化景观自然转化为多种文化景观的社会认知方式,文化地理学家也拥有了非

物质文化景观的多种观察视角。在认知景观基础上,首先确定表征特定视角的一种或多种载体组合,并寻找适宜的时空尺度,继而开展景观格局、文化生态、文化区、文化扩散与演进等研究,形成丰富的文化景观语义。语

义景观仍然处于文化表达与分析的浅层区,景观内涵如何解读与语义背后的形成机理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研究的最终目标。通过赋予适宜时空尺度的文化载体,继续挖掘景观背后的性别意义、政治意义、消费意义、权利分配、地方认同和不同群体与景观的关系,形成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景观。

在文化景观时空思维体系中,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构成文化景观系统,系统内的自然、经济、社会、政治和其他文化要素的相互关系研究需要在单文化景观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探讨与分析;而区域内多文化景观的综合研究亦可以建立在单文化景观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关注文化间的融合、排斥、相互支撑及由此引起的文化演变。

5 结论与讨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可以通过各种文化载体进行表达。在系统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表达的 6 种实载体,包括艺人(传承人)、文化团体、作坊(场所)、作品、文化受众、店铺与市场,并提出互联网等虚拟空间中的网站、电子社区等虚拟载体。通过载体空间属性实现载体空间化,进而形成 5 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构建空间、区位空间、实体活动空间、社会空间和感知空间。

文化景观时空尺度依赖于载体属性和景观主题。空间尺度可以表现为大、中、小和微观尺度,不同空间尺度适于不同的文化景观解读视角。载体属性与解读视角的多元化使空间尺度需要动态跳跃、转化与组合。时间尺度界定必须考虑文化景观的意义及建构景观的载体数量和属性,单文化载体、多文化载体和全载体文化景观的时间尺度界定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特点。文化载体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研究的时空尺度问题得到解决,并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研究的时空思维体系和自下而上研究的新模式。本研究探讨如何借助载体表达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尤其是人(如艺人、受众)等作为载体可能受到质疑:是否与非物文化本身的属性相符?其实,非物质性强调的是传承中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传递模式,并未否定其依附性和承载性。艺人是文化景观系统中的特殊群体,是文化精髓的承载者,对于文化景观核心、重心的界定具有重要意义;而受众则是文化景观域边界判别的直接依据。把这些群体作为文化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研究的重要基础。本研究是试图将 GIS 方法和思维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学研究的一种理论探讨,既能整合传统文化地理的思维模式,又能满足新文化地理的多元化视角,对于文化地理学科体系完善、研究方法的丰富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云才. 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之图式语言及其传承[J]. 中国园林, 2009, 25(10): 73 - 76.
- [2] 毕硕本, 闫国年, 陈济民. 基于空间分析的史前郑洛地区连续文化聚落研究[J]. 地理科学, 2008, 28(5): 649 - 655.
- [3] 角媛梅, 程国栋, 肖笃宁. 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及其保护研究[J]. 地理研究, 2002, 21(6): 733 - 741.
- [4] 侯光良, 刘峰贵, 萧凌波, 等. 青海东部高庙盆地史前文化聚落演变与气候变化[J]. 地理学报, 2008, 63(1): 34 - 40.
- [5] 杨瑞霞, 鲁鹏, 武慧华.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2, 31(1): 50 - 55.
- [6] 邓运员, 申秀英, 刘沛林. GIS 支持下的传统聚落景观管理模式[J]. 经济地理, 2006, 26(4): 693 - 697.
- [7] 李凡. GIS 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8, 24(1): 21 - 26.
- [8] 吴康. 戏曲文化的空间扩散及其文化区演变——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为例[J]. 地理研究, 2009, 28(5): 1427 - 1439.
- [9] 夏玢. 地理环境对黄梅戏的影响的初步研究[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6, 18(2): 107 - 110.
- [10] 吴惠平. 论书法地理的地域空间研究[J]. 人文地理, 2001, 16(2): 93 - 96.
- [11] 陈述彭, 黄飏.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J]. 地理研究, 2005, 24(4): 489 - 498.
- [12] 李凡, 司徒尚纪. 民间信仰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及对社会文化空间的整合: 以明至民国初期佛山神庙为视角[J]. 地理研究, 2009, 28(6): 1550 - 1561.
- [13] 薛熙明, 朱旋, 唐雪琼. 城市宗教景观的空间布局及演化——以 1842 年以来的广州基督教教堂为例[J]. 人文地理, 2009, 24(1): 48 - 52.
- [14] Crawford T W. Stability and Change on the American Religious Landscape: A Centographic Analysis of Major U. S. Religious Groups[J].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 2005, 22(2): 51 - 86.
- [15] 艾大宾, 李宏芸, 谢贤健. 农村居民婚姻迁移空间演变及内在机制——以四川盆地为例[J]. 地理研究, 2010, 29(8): 1427 - 1439.
- [16] Luo W, John H, Liu J X, et al. Geographic Patterns of Zhuang(Tai) Kinship Terms in Guangxi and Border Areas: A GIS Analysi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Change[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7, 8(4): 575 - 596.
- [17] Kerfoot H. Geographical Names: Some Current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ited Nations[J]. The Cartographic Journal, 2004, 41(2): 89 - 94.
- [18] 王彬, 岳辉. GIS 支持的广东地名景观 EOF 模型分析[J]. 地理科学, 2007, 27(2): 281 - 288.
- [19] 王均, 陈向东, 宇文仲. 历史地理数据的 GIS 应用处理——以清时期的陕西为例[J]. 地球信息科学, 2003, 5(1): 58 - 61.
- [20] Cosgrove D.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M]. London: Croom Helm, 1988.

[21] Daniels S. Marxism, Culture and the Duplicity of Landscape[M]// Agnew J, Livingstone D N, Rodgers A. Human Geography: An Essential Antholog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6: 331 – 340.

[22] 李蕾蕾. 从新文化地理学重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框架[J]. 地理研究, 2004, 23(1): 125 – 134.

[23] 唐晓峰, 周尚意, 李蕾蕾. 超级机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J]. 地理研究, 2008, 27(2): 431 – 438.

[24] 薛熙明, 朱竑. 广东基督教教案的时空演变(1584—1910)[J]. 地理研究, 2008, 27(3): 693 – 702.

[25] 张捷. 基于人地关系的书法地理学研究[J]. 人文地理, 2003, 18(5): 1 – 6.

[26] 姚华松, 许学强, 薛德升. 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空间的再认识[J]. 人文地理, 2010, 25(2): 8 – 12.

[27] 李蕾蕾. 当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知识谱系引论[J]. 人文地理, 2005, 20(5): 77 – 83.

[28] 约翰斯顿. 人文地理学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32.

[29] 宋奕. 福柯的启示: 空间视角中的“文化遗产”[J]. 东南文化, 2012(4): 15 – 20.

[30] 保罗·诺克斯, 斯蒂文·平奇. 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 柴彦威, 张景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57 – 58, 62.

[31] Smith N. Homeless/Global: Scaling of Places[M]// Bird J, Putnam T, Robertson G, et al.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3: 87 – 119.

Research on Intangible
Cultural Landscape: Landscape Carriers,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Scales

Li Renjie^{1,2}, Fu Xueqing^{1,2}, Zhang Junhai^{1,2}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2. Hebei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no universal thinking system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es, and we also have some barriers of introducing method of regula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representation into the research procedure. The authors provide a new idea for represent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landscape,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the landscape carriers. The culture landscape carri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is called the physical carrier and the other is the virtual carrier. The physical carriers can be artists, culture organizations, workshops, works, audiences, and shops and stores. The virtual carriers are websites, forums, and blogs etc. which are emerging in World Wide Web or other medium. By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carrier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thinking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The spatial scal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landscape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4 grades, such as large spatial scale, middle spatial scale, small spatial scale, and micro spatial scale. The way of temporal scale division is analysed comprehensively, especially for the culture landscapes constructed based on a single carrier, multi-carriers, and the whole carriers. By absorbing the academic ideas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 the authors provided a system of spatio-temporal thinking for research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landscape, which i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points, such as culture landscape carriers,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carriers, and spatio-temporal scales. This spatio-temporal thinking system will help to introduce methods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into the research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geography, and provide multi-views for information mining. This study h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eaning for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e; cul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landscape carrier; spatial representation; spatio-temporal scales